

Robert Vannoy博士，旧约历史，第 19 讲

© 2012, Robert Vannoy博士, Ted Hildebrandt

考古学，父权时期

考古学和圣经历史

我们正在讨论考古学在评估圣经历史陈述中的作用。我想强调两件事：第一，就证据的解释而言，考古证据往往是暂时的。事实上，这是第二件事。首先是考古发现结果的碎片性。

考古数据解释的暂定性质我们正在讨论考古数据解释的暂定性质，我刚刚向大家介绍了Ezion-geber所罗门铜矿和该地区的问题以及对考古学数据的研究。纳尔逊·格鲁克的证据。他正在寻找所罗门在以旬迦别的海港，列王记上 9:26 中提到了这一点。所罗门王在以旬迦别建立了一支海军。格鲁克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但他发现了铜冶炼的证据。他来到一座建筑物前，断定这是一座冶炼炉或炼油厂。大楼里有一些房间，墙上有两排洞。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孔是羽流，通过这些羽流将气流吸入房间来熔炼铜矿石。该建筑的位置使其受到了从北部阿拉巴谷吹来的风的影响。因此，建筑物可以向一个方向移动一点或向另一个方向移动一点，并且它会得到更多的保护；它不会受到这些风的全部力量。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它被放在那里是为了收集这些风，然后将它们引导到这些羽流中以熔炼铜矿石。所以他说这是历史上第一座高炉，位于以济安迦别地区。在第 11 页的参考书目中，有两篇由 N

elson Glueck撰写的文章。第一个是“1939年第二次埃齐安盖贝尔战役”。它发表在美国东方研究学会公报（BASOR）上。他在那篇文章中说道：“Ezion-geber是精心规划的结果，是一个具有卓越建筑和技术技能的模型装置。事实上，从地点和时间上考虑，几乎整个埃齐安-盖贝尔镇都是一个非凡的工业遗址，在整个古代东方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Ezion-geber是旧巴勒斯坦的匹兹堡，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海港。”于是，他找到了这座建筑并得出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随后被许多圣经考古学手册所采用，证实了所罗门的贸易活动集中在以锡安迦别。这里就在埃拉特以北，但贸易无疑是通过红海向东进行的。

因此，人们认为这揭示了《列王纪上》9:26，其中说所罗门在以旬迦别建立了这支海军。他肯定从事铜贸易，将铜带到南部和东部，然后再带回来。列王纪上第十章二十一节：所罗门王的酒杯都是金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没有任何东西是用银制成的，因为在所罗门时代，银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国王拥有一支海上贸易船队以及海勒姆的船只。它每三年回来一次，带着金、银、象牙、猿和狒狒。所罗门王的财富和智慧超过了世上所有的君王。”显然，他正在用铜换取许多其他东西。

嗯，情况可能仍然如此，埃齐安-格贝尔涉及的是铜贸易。但改变的是那本书最初对建筑物用途的解释，后来他完全修改了。在1965年撰写并发表在《圣经考古学家》上的第二篇文章“Ezion-geber”中，他说他和其他人现在认为这座建筑墙上的洞仅仅是腐烂或燃烧木头的结果。横梁。它们被放在那里是为了将横梁

安装到墙上。他说，在许多其他地方也发现了这种建筑。与其他已曝光的地方相比，结论截然不同。他觉得铜冶炼的方式完全不同，在小坩埚中用炭火加热，只生产出小铜纽扣。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方法。那里生产铜，他仍然自己填写这些点，但没有像我在他最初的报告中听说的这个高炉那样。

最近，1972 年，一位名叫 Beno Rothenberg 的人（这是第 11 页底部的条目）写了这本书，《蒂姆纳：圣经铜矿之谷》。他根据同一地区的发掘得出结论，采矿活动仅限于公元前 14 世纪至 12 世纪。现在，如果您思考一下，这意味着所罗门根本没有参与铜贸易，因为 14 世纪到 12 世纪是马赛克时代，而不是所罗门时代。罗滕伯格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西阿拉巴在公元前 12 世纪以后有任何铜矿开采和冶炼活动，直到罗马时期该行业的复兴。所以他说从 12 世纪到罗马时期没有铜冶炼活动。然而，看看 J. Bimson 的文章：（大约是第 11 页的中间）“所罗门王的地雷？对阿拉巴发现的重新评估” - 《廷代尔公报》，1981 年。Bimson 与 Rothenberg 的材料进行互动。在那里列出的那篇文章中，他为自己的结论提出了理由，我将引用他的话，他说：“所罗门时代阿拉巴采矿和冶炼活动的归属已被轻易驳回。在对阿拉巴采矿历史的重新评估中，放射性碳测年结果表明，所罗门群岛的活动对一个地方的争夺最为激烈。”

现在，我不打算解决所罗门是否从事铜冶炼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所罗门是否从事铜冶炼的问题。这将是一次非常技术性的讨论。我在这里试图说明的是考古数据解释的尝试性问题。我们让格鲁克表现强劲，然后改变了他的立场，然后罗滕伯

格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立场，宾森提出了一个恢复所罗门在那里的想法的观点，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还有很大的争论空间了解证据是什么。考古发现往往就是这种情况。这两件事有助于提供一个视角：第一，证据的碎片性，因此我们不会仅仅因为未经证实而得出可疑的结论；其次，在许多情况下，证据解释的尝试性。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但对于像墙上有洞的建筑物之类的东西，你只是在做出猜测。有了这样的证据，你就必须非常小心。与任何其他人类努力一样，考古研究也可能会出现错误。考古学家可能会犯错误。

我不认为格鲁克有压力。我认为那里的那种结构，至少从我对证据的理解来看，在其他地方并不存在，所以他最初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结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这确实是他整个理论的关键。我不认为这只是来自其他人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你知道你必须在那里，特别是与那些对圣经的可信度等有偏见的人在一起。大约在同一时间，格鲁克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大约在 1965 年的那个时候。从我读到的内容看来，人们普遍认为这座建筑不是一个冶炼炉。还有埃及的一个部分和约旦的一个部分也在那里——它们都一起进入那里，你最多可以在一英里左右的范围内到达这三个国家。我认为我们应该欣赏和利用考古学对圣经的启示，因为它在阐明圣经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帮助我们今天比考古学研究发现之前更好地理解旧约的文化背景。它有很多价值，我们应该欣赏和利用它。但我们需要牢记它的不完整性和许多发现的尝试性，并且在说阅读它证明或反驳圣经的方式时要小心。

考古资源：BAR ... 让我们继续罗马数字 V。我强烈建议您阅读有关圣经考古学的期刊。有几本出版物，但我建议阅读《圣经考古学评论》。我不知道你是否熟悉这一点，但《圣经评论》是由出版这本书的同一个人出版的。他们出版了《圣经考古评论》，它非常成功，因为它是一本相当有吸引力的出版物，它有图表、更多彩色图片、流行的文本、插入内容和不常提及的主题。从非常保守的角度来看，这就是问题所在，但它是有关考古学和近东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巨大信息来源，所以我认为现在阅读它是一件好事。我认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所以他们推出了《圣经评论》，这不仅仅是考古学—它还涉及对圣经解释和一般历史以及神学的讨论。这种倾向相当自由，但它是以一种有吸引力的、非常可读的方式完成的。与《圣经考古学家》相比，《圣经考古学评论》是一本较新的出版物。《圣经考古学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多年来一直是圣经考古学的标准。这是一份技术性更强的出版物。它的格式不太吸引人：它过去出版时没有很多图片，而且是黑白的。对于普通外行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你拿起和阅读的东西。当《圣经考古学评论》开始出版时，它几乎淘汰了《圣经考古学家》，直到他们改变了自己的风格。他们提出了一种更像《圣经考古学评论》的风格，尽管仍然不太受欢迎，而且仍然更具技术性。但这两本肯定是有价值的杂志：《圣经考古学家》和《圣经考古学评论》。

这个有一些值得你关注的东西。因为这篇关于圣经地图的文章，我在公文包里放了这个。它们的可靠性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正在讨论的内容有关：它回到了站

点识别。你在圣经中读到，某个地方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情，而那个地方已经不复存在了。有大量的线索和土堆。问题是，你认为哪个土堆是圣经遗址？你打算怎样做呢？本文指出，该领域有很多初步结论。

至于地点识别，我们稍后会在谈到约书亚，特别是艾未未的地点时讨论这个问题。当约书亚带着亚干的罪上那里时，以色列人被击败了。最终他们占领了艾城，但挖掘该土丘的考古学家说，在约书亚时代，该土丘并未被占领。根据考古学家的说法，关于占领的整个事情很混乱，很可能是一个关于征服伯特利的故事，因为伯特利在那段时间被占领，而艾城却没有。我们稍后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站点识别案例。他们假设的地方是艾城，但其实并不是艾城。有人提出了替代地点的建议，在这篇关于圣经地图的文章中，我有点扯远了，再次强调考古发现的暂定性质。

这家伙讨论告诉赫什本的网站。他说，《民数记》中提到了希实本，那里的考古工作表明，希实本的记载给那些只看表面上的圣经记载的人带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他们认为这次征服发生在青铜时代晚期，但考古学并没有证实这一点。然后他评论说，许多在过去一个世纪认真对待《民数记》21-30章文学批评研究成果的学者，对《泰尔希实本》的考古发现并不感到惊讶。虽然文学评论家并不总是就细节达成一致，但他们一致得出结论，民数记21至30章的叙述部分属于后期的社论风格。本节引用的这首诗属于以色列人征服晚期约旦王国的时期。换句话说，对这段文字的文学分析已经对其历史重建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考古发掘正好证实了这

些疑虑。现在你看，你陷入了文学批评分析与考古分析相结合的双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两者都是负面的。但他的下一段让我感兴趣，因为他说文学分析确实需要某种程度的主观判断。诚然，当不同的文学批评家对同一文本进行研究时得出不同的结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是令人不安的。你不必读太多文学作品就能找到这一点。

但他接着说：“我完全不相信，用来源、形式、历史和传统批评的信息来分析古代文本，与在山上挖掘一个十五英尺见方的地方相比，或多或少是主观的。这两种方法都涉及精心制定的程序，旨在确保客观性，但几乎每一步都需要做出判断性决定。”换句话说，关键是，你在做文学批评或者考古工作的时候，每一步都有主观判断，你无法避免。他说：“如果不同的考古队有可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挖掘同一座山的一段，如果发掘报告中的负责人并不总是有最终决定权，我怀疑普遍认同的模式与上个世纪文学批评研究和圣经的模式大致相同。”换句话说，每次你这样做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取决于导演是谁。这取决于你如何做出这些判断。

对于学术工作来说，这一原则很难被排除。你来到某事是为了寻找某事，因为你正在寻找一些东西来组织你看待事物的方式、你的结论是什么、证据是什么以及你如何将事物组合在一起，所以它是你永远拥有的东西与之斗争。你必须在你的神学和整理圣经的过程中与它作斗争。你来寻找这个或那个或其他事情的证据，你很可能会找到它。

V. 创世记 11:27-创世记 50 创世记 11:27 分部 我们继续来看族长时期，创世记 11:27 到创世记 50 章。这是一个新的主要部分。首先，让我评论一下创世记 11 章 27 节的分界点，那里有我们之前谈到的那句话：“这是他拉的后裔”，“这是他拉的后裔”，还有那句话。“这些都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提到第一句话在创世记中出现了十次，这是一个主要的分界点。现在似乎要开始这个新的部分了。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它之前的内容，而是它产生的结果。这是关于亚伯拉罕的。所以你现在可以缩小圣经理史的范围，因为在创世记 11:27 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全人类的历史。你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洪水，从诺亚开始，你又重新开始。诺亚的三个儿子遍布全地，但从现在起，我们就有了一个特定家庭的历史，这个家庭已被上帝选中，接受他的启示，并通过他们来继续他的启示和救赎工作。因此，这里的普遍时期让位于特殊时期。这确实是上帝第三次从家庭开始。他对亚当这样做了，他对诺亚也这样做了，现在他从所有的家庭中选择了亚伯拉罕。

父权制账户的真实性 我想讨论一下父权制账户的真实性。在本世纪初，批评界认为族长只是真正的传奇人物，部落的四个化身，而不是真正的个人，当然也不是历史人物。这是韦尔豪森方法和追随他的人的结果。这种消极态度有所扭转。与本世纪初相比，今天人们普遍对父权叙事的历史性更有信心。比较一下这两种说法——我引用韦尔豪森本人的话，他说：“我们获得了族长的历史知识，但仅限于有关他们的故事在以色列人民中出现的时候。我们对父权时代一无所知，我们只了解以

色列被流放的时期。”他说，这个晚期时代的内在和外在特征无意识地投射回古代，并像美化的海市蜃楼一样反映在那里。我们从父权叙事中没有学到任何关于父权时代的历史价值。相反，它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它被写成的时间的信息，而不是关于它据称记录的时间的信息。

与约翰·布莱特的这种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他写了一本可能是以色列标准历史的书，并在主流教派神学院中使用，《以色列历史》，第三版。约翰·布莱特是弗吉尼亚联合神学院的旧约教授。读完这本书，你会受益匪浅；他是威廉·F·奥尔布赖特的学生。他不是一位福音派学者，但他的态度比德国学者普遍保守得多，当然也比韦尔豪森保守得多。因此，当他谈到有关族长的问题时，第 12 页。在第三版的第92页中，他说：“迄今为止得出的证据使我们完全有权利确认父权制叙事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但我们必须就此止步吗？我们是否必须将族长视为非个人氏族运动的反映？一点也不。尽管我们无法重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生活，但我们可以自信地相信他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现在他不会说父权制的记载在历史上是完全可靠的，但他确实与韦尔豪森相去甚远，他说我们可以自信地断言他们是历史上的个体。现在，这种更积极的态度已经普遍存在，特别是在这个国家，甚至在过去 25 年左右的批评学者中也是如此。

父权制历史的极简主义方法：汤普森和范塞特斯 但有趣的是，最近它再次受到挑战。换句话说，有些人想把时光倒回旧的威尔豪森那种立场。在你的参考书目中

有两卷，你至少应该知道其作者的名字。TL Thompson, 《父权叙事的历史性》，1974年在纽约和柏林出版。J. Van Seters, 《亚伯拉罕的历史与传统》，耶鲁大学出版社1975年。现在这两本书是独立撰写的，视角有些不同，但两者都是它们本质上挑战了这种对族长历史性的更积极态度，它们是重要的书籍。

汤普森认为，布莱特关于父权叙事历史性的所有证据主要基于间接证据，这对他来说并不令人信服。汤普森在他的卷的第328页上说：“救赎历史并没有发生。它是一种有其自身历史背景的文学形式。圣经没有提到历史上的亚伯拉罕。”这些都是激进的言论。您可以阅读此类书籍的评论。这是一件相当好的事情；总的来说，得到了相当好的反响。在美国学术界和圣经研究的标准期刊《圣经文学杂志》上，一位犹太学者的审稿人说：“这本书的目的是回顾圣经学者所持有的中心论点，赞成创世记中族长的历史真实性。在我看来，汤普森的评论等于是对这些论点的彻底反驳。”换句话说，你可能会说所有布莱特和奥尔布赖特以及像这样的人都有更积极的事情，汤普森却来攻击其所依据的证据。这位犹太学者说，“这相当于对这些论点的反驳”，并让时光倒流到对先前立场的怀疑。在英国标准期刊《神学研究杂志》（牛津或剑桥出版）中，JA埃默顿说：“他没有证明族长不存在，但他证明了关于神学传统的实质历史性。它们太容易被许多学者接受了。汤普森的工作可能会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研究引入一个新阶段。”当心，有一个新的挑战。我认为事情将如何发展还没有定论。人们会跟随汤普森和范塞特斯回到更加持怀疑态度的立场吗？或者事情会更多地保持布莱特甚至奥尔布赖特的路线，受到福音派

的影响，甚至比这更积极的态度？我不知道，我认为还有待观察。

这里有一本由福音派学者撰写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集，仅供您参考。你的纸上有一本由米勒和怀斯曼担任编辑的《父权叙事论文集》。这是最近出版的，书中有很多与 van Seters 和 TL Thompson 互动的好文章。所以现在正在进行很多讨论。我可能只是顺便说一下 TL Thompson，看看那本书是在什么地方出版的？1974 年。那一定是 1975 年左右的事了，一天晚上，我在图书馆，一名学生走过来对我说，他刚刚和图书馆另一部分的某个在图宾根学习《旧约》的人谈话，我我想我要去见那个家伙，所以我就去了。我去和他交谈，我们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谈话。我发现他的名字叫 TL Thompson，但当时这本书刚刚出版，我不知道他是谁，你知道。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刚从德国留学进入这个领域，而这本书是他的论文。他的妻子在坦普尔大学任职，他们住在一个拖车公园里。直到大约一年后，甚至可能没有那么久之后，TL Thompson 的名字对我来说才变得毫无意义。大约一个月左右后，我才知道他的书，然后你知道这本书里有故事，我才意识到他是谁。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确实写了一本重要的书，但他正在使用我们的图书馆进行他自己的研究。我认为他和他的妻子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或类似的地方工作。他们在这个领域呆的时间不长。

努兹, 马里和其他早期文本与父权时期

好吧，回到我开始的地方，汤普森和范塞特斯试图回到更批评的立场，这部

分发生了逆转。一般来说，对族长历史性的态度出现了这种逆转和这种逆转，这实际上是由于考古学研究，仅来自于与族长叙事几乎同时发现的数千份文本，他们对这一时期做出了很多贡献。让我就这些文本为您回顾一下主要的收藏。文本的主要部分首先是关于公元前 18 世纪的努祖(Nuzu) 和马里 (Mari) 文本。马里 (Mari) 位于巴比伦以北的幼发拉底河上。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被法国人挖掘的，这座城市在公元前 1700 年左右是当时的一个主要强国 现在的父权制时期，即亚伯拉罕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 2000 年 所以我们已经从那之后的几百年开始了，大约与雅各布同时。因此，在一场战争中，它被汉谟拉比击败之前，它是当时的一个主要强国。宫殿中发现了大约 20,000 块石板，其中有汉谟拉比和齐姆里·林以及其他国王之间的书信往来。您还有关于占卜技术的文本。他们的技术之一是检查祭祀动物的肝脏和内脏，根据动物的肝脏形状的配置，这种事情有一定的意义或意义。在族长叙事中多次提到拿鹤城，这是利百加的家乡。

所以你有这组文本，然后你有卡帕多西亚文本，它们在小亚细亚东部角落发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9^{世纪}。它们来自亚述商人的殖民地，他们当时正在与亚述商人进行贸易。小亚细亚人民，他们在城镇外有定居点。

第三组是努兹文本，出现于公元前15^{世纪}，反映了大约15世纪东底格里斯河地区^{努兹}地区胡里安人的风俗习惯。您在Finegan第 65、67 页中读到了这些努兹文本，其中包括对奴隶收养法、婚姻契约、继承权和此类习俗的讨论，这些内容与父权叙事中反映的类似习俗相当密切。

第四是拉斯沙姆拉 (Ras Shamrah) 文本, 15^{世纪}和 14^{世纪}, Finegan 171-174。它们于 1929 年在叙利亚 (今天的黎巴嫩) 海岸, 一个叫乌加里特的地方被发现。它们是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楔形文字是一种书写方式, 需要将铁笔按入粘土中以做出标记。它们是用楔形文字书写的, 但它是闪米特字母语言。在 1929 年这些文本被发现之前, 这种语言是未知的, 当时它被破译并被发现是一种与圣经希伯来语密切相关的闪族语言。因此, 乌加里特语的研究成为一项新的研究, 对其中一些文本的语言学研究揭示了希伯来语的某些语法特征和词汇问题, 因为它们是相关语言。

第五组是咒骂文本, 来自公元前 20^{世纪}和 19^{世纪}的埃及, 说明了法老如何寻求用魔法力量来对付他的敌人。其做法是在碗上写下咒语或咒语, 然后将碗打碎。有时, 这些咒语会写在被束缚的俘虏的泥人雕像上。但在这些铭文中, 有很多地方提到了迦南地, 这些地方可以让我们了解公元前 20 世纪和 19 世纪

埃及势力范围延伸到迦南地的范围。埃布拉文本, 大约公元前 24^{世纪}。如果你想读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我的参考书目中没有, 但 KA Kitchen 有本书《圣经的世界: 今日圣经与考古学》。其中有一章是关于 Ebla 的, 而 Ebla 当然是最近才出现的东西, 关于它没有太多可说的, 因为 Ebla 文本中发布的内容 (如果有的话) 还很少。让我简单介绍一下它们。他们是在一个叫 Tel 的地方被发现的 马尔迪赫 (Mardikh), 位于贝鲁特 (今叙利亚) 北部和西部。1968 年, 在那里挖掘的土丘被确认为埃布拉 (Ebla)。当然, 有一个土丘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 但没

有人确切知道它是什么。1968年，它被确定为一个名为埃布拉（Ebla）的地方，1975年，人们在一座宫殿的废墟中发现了17000块楔形文字板。经确定，这座宫殿于公元前2250年左右被毁。这将是父权制时期之前的几个世纪。现在有人说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关于埃布拉药片的意义和重要性，人们有很多夸大的说法。这些泥板揭示了一个在公元前^{24世纪}左右统治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帝国，这是以前不为人知的。这是一个主要的帝国。在文本中，圣经中的城市和人名都出现在石版上，包括所多玛和蛾摩拉等地以及希伯和亚伯拉罕等名字。并不是说那里的亚伯拉罕与圣经中的亚伯拉罕相同，但是亚伯拉罕个人的名字确实出现了。除了行政文本、政府之类的东西之外，据说还有文学文本，包括创世神话和洪水、赞美诗和条约文本，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材料。并非所有内容都已发布，并且访问权限也非常有限。有权接触的人非常小心，不要让叙利亚政府反对他们，因为这些事情的研究与犹太教的历史有太多的圣经联系，所以他们没有说太多。很难知道这种情况何时会改变。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能够接触到这些文本的人似乎淡化了这些文本与旧约的关系，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但是，作为结论，从这些材料中，有很多材料，很明显，《创世记》中描述的父权制习俗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文本中反映的习俗很接近。关于他们的事反映在父权叙事中。其次，这一点甚至可能更重要，早期的希伯来语名称符合已知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特别是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流行的一类名称。

父权名称

现在，让我给你们读一下布莱特的《以色列史》，第 77 和 78 页。例如，族长本身的名字“雅各布”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上游 18 世纪的文本中。亚伯兰这个名字是从第一王朝的巴比伦文字中得知的，也可能是从咒骂文字中得知的。虽然没有提到以撒这个名字，显然也没有提到约瑟夫，但这两个名字都属于典型的早期类型。此外，拿鹤和他拉的名字以及雅各和便雅悯儿子的名字也出现在马里文本中。西布伦这个名字出现在咒骂文本中。迦德和丹是马里人。以实玛利和利维或许都出现在马里。亚设和以萨迦出现在 18^{世纪}埃及的名单中。”然后他说，“对此必须加上埃布拉文本，据我们所知，其中发现了许多圣经中的个人名字：埃伯·亚伯兰，以实玛利，扫罗，大卫，以色列，以及其他。现在，”他总结道，“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案例中，我们甚至可能没有提到圣经中的族长。但当代文献中大量此类名字清楚地表明，美索不达米亚上游和叙利亚北部确实拥有类似于青铜时代中期和几个世纪前以色列祖先的人口。这既增强了人们对这一传统古老性的信心，又增加了《圣经》关于以色列祖先从这一地区迁徙而来的说法的真实性。”但接下来的一个重要声明是：“这些名字属于早期类型。它们当然不是后来以色列命名法的特征。”换句话说，后来以色列的命名法意味着这些东西是在流亡期间写的。

他说：“这些名字都不是族长本身的名字，在整个圣经时期，与他们有关的人的名字也很少再次作为以色列的专有名称出现。”我的意思是，后来你不会在圣经中遇到亚伯拉罕。所以他说，“这方面的父权叙事是最真实的。”这就是艾

伦·麦克雷 (Allan MacRae) 谈论的那种事情，直接和间接的佐证。这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父权叙事符合它们所代表的时代。

转录：Laura King 和 Derek Skeen、Ruben Cabrera、Dave Fogg、Ben Watts、Kate Tortland

粗略编辑：Ted Hildebrandt

最终编辑：艾米丽·麦克亚当

由 特德·希尔德布兰特重新叙述